

---

March 2016

## The Debate on the Grade of Tao Yuanming in Zhong Rong's *Tastes of Poetry* in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Xun Y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Yang, Xun. 2016. "The Debate on the Grade of Tao Yuanming in Zhong Rong's *Tastes of Poetry* in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2): pp.118-13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2/17>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现代学术史上的“陶诗品第”之争

杨 焄

---

**摘要:** 齐梁时期的锺嵘在《诗品》中将陶渊明列入中品,后世不少评论家都认为品第不公。明清以来如王士禛等人甚至认为陶诗应置于上品,但相关的批评并没有文献依据或理论阐发。及至现代学界,对《诗品》的研究日趋严密细致,由古直率先发端,提出在《太平御览》所征引的《诗品》上品诗人名单中原本就列有陶渊明,随即引发海内外诸多学者参与争论。或引据文献,认为今传《诗品》曾遭后人篡改;或认为对于锺嵘如此品评,根本毋庸置疑。由此展开对《诗品》的版本源流及体例义法,锺嵘的诗学观念及品评标准,乃至陶诗的流传及接受情况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讨。通过梳理这桩公案的始末原委,可以发现传统学术研究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诸多特征。

**关键词:** 锺嵘; 《诗品》; 陶渊明; 陶诗品第; 学术转型

**作者简介:** 杨焄,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电子邮箱:xyang@zhwx.ecnu.edu.cn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诗话全编》[12&ZD160]阶段成果。

---

**Title:** The Debate on the Grade of Tao Yuanming in Zhong Rong's *Tastes of Poetry* in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Abstract:** In his *Tastes of Poetry*, Zhong Rong (468–518) put Tao Yuanming to the middle grade, which caused much objection from later critics. Wang Shizhen (1526–1590) thought that Tao should be put to the top grade, although he had not done any theoretical analysis or produced any evidence from research literature. The recent research on *Tastes of Poetry* found that Zhong Rong had put Tao Yuanming into the rank of top grade poets, as quoted from *Taiping Yulan*. The entailed debate evolves round such issues as whether the critics had been reading the original *Tastes of Poetry* and whether Zhong Rong's way of ranking should become a point of departure in academic debate. The editions, exemplifications in the book, ideas and criteria of poetry as well as the reception of Tao Yuanming have all been the issues in the debate. This paper tries to delineate this academic case and hopes to disclose some features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cademic tradition.

**Keywords:** Zhong Rong; *Tastes of Poetry*; Tao Yuanming; ranking of Tao Yuanming poetry;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Author:** Yang Xun,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Email: xyang@zhwx.ecnu.edu.cn

---

齐梁时期的锺嵘在《诗品》中将陶潜列入中品,并称:“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锺嵘 曹旭 336–37)。尽管他早已有言在先:“致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

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锺嵘 曹旭 244)。但依然激起后世不少非议。尤其是明清以来的评论家,往往质疑锺嵘对陶诗品评不公。明人闵文振认为《诗品》将陶潜“置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辈,顾右于潜耶?论者称嵘洞悉玄理,曲臻雅致,标扬极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独惑于处潜焉”(闵文振 周维德 625),对陶

潜品第逊于王粲、阮籍等人深感困惑不解。清人王士禛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品的陶潜“宜在上品”(王士禛 丁福保 203)。可是语气虽然斩钉截铁,却并无文献依据或义理阐发,至多只能表明随着时代风气的递嬗,人们对于陶诗的认识和评价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在现代学术史上,围绕着《诗品》中“陶诗品第”的话题,再度引发海内外一大批学者展开讨论,整个过程持续长达半个多世纪。在这场争论的前半程原本已有定谳,却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余波不断。经过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促使诸多学者从各个角度深入研讨《诗品》及陶诗在流传、接受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重新梳理这桩影响深远的公案始末,不难发现传统学术研究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重要特征。

### 一、从“宜在上品”到“本在上品”

这场争论最初起源于古直在 1926 年出版的《陶靖节诗笺》,在该书《徐录》中列有《订评》一项,提到:“鍾嶸《诗品》列陶公于中品,后世论诗者多讥其不当,然考《御览》五百八十六引鍾嶸《诗评》曰:‘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是则今传《诗品》乃后人错乱之本,以此蔽罪鍾嶸,嶸不任受矣”(陶渊明 古直《徐录》4a-b)。他对自己的新发现显然极为得意,在两年后刊行的《钟记室诗品笺》中,又不惮繁琐,重申此论。仅在《发凡》中就三次提及,始则曰:“陶公本在上品,《御览》尚有明征。王贻上不考,大肆讥弹。以此推之,魏武下品,郭璞、鲍照、谢朓等中品,安保不是后人窜乱乎?”(鍾嶸 古直《发凡》1a)。继而云:“陶潜今列中品,据《御览》所引,则在上品”(鍾嶸 古直《发凡》3a)。终则谓:“靖节本在上品,《御览》可征”(鍾嶸 古直《发凡》4b)。随后在《中品》“宋徵士陶潜诗”条下详加论说:

案《太平御览》五百八十六:“鍾嶸《诗评》曰: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据此则陶公本在上品,今传《诗品》列之中

品,乃后人窜乱之本也。(鍾嶸 古直  
《中品》6a)

综合其说,不仅依据《太平御览》的引文对《诗品》中的陶诗品第提出异议,认为今本序次乃遭后人改窜,还进一步质疑曹操、郭璞、鲍照、谢朓等人的品第也同样存在问题。“陶公本在上品”的重大发现,尤为引人瞩目。在当时极具社会影响力的《申报》曾经连续刊登广告推介古直的系列著作,在述及《钟记室诗品笺》时就突出这一点进行宣传:“评诗名著,无过《诗品》。前人病其抑陶公,此笺据《御览》证明陶公本在上品也。”<sup>①</sup>借助现代出版印刷和新闻传媒的力量,古直就此揭开了这场“陶诗品第”之争的序幕。

乍看之下,古直的“新发现”在令人惊诧兴奋之余也不免心存疑惑:虽然《太平御览》卷帙浩繁,但并非冷僻罕见之书,难道千百年来就无人觉察,而尚待今人发覆抉微?可细究之后,就能明白事出有因。前代有关《诗品》的研究,绝大部分都散见于诗文评著作中,吉光片羽,要言不烦,虽能启人心智,却嫌支离破碎,从未有人集中精力深入调查其流传本末。清代考据之学兴盛,《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虽备受重视,但学者大都借此考校经史,偶或旁及诸子,鲜有利用其中资料去研讨集部文献,更何况《诗品》所属的诗文评只是集部中的一小部分而已。<sup>②</sup>而早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比起中国文学史研究来,则要滞后很多,在筚路蓝缕的阶段,对相关文献的考察也并不充分。张陈卿的《鍾嶸〈诗品〉之研究》是现代学术史上首部《诗品》研究专著,在介绍该书流传状况时只是说:“《诗品》一书,除近来中华图书馆印有一种《诗品》《诗式》合本外,别没有见过单行本,都是在丛书中”(张陈卿 31)。根本没有注意到《太平御览》《山堂考索》《玉海》等类书中曾经引述过《诗品》。郭绍虞在 1933 年发表的《诗话丛话·鍾嶸〈诗品〉》中说:

其书在宋以前犹不甚显,故唐宋类书,除本有诗话性质者,如《吟窗杂录》等,间或节引数语以外,余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事类赋注》等书均未见称引。自明以来,刊行丛书之风渐盛,于是《诗品》遂

以收入丛书之故,始见流行。因此,关于《诗品》的版本亦殊不易稽考。(郭绍虞 曹旭 102-03)

在次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他又有几乎同样的论断:“案是书晦于宋以前而显于明以后。故唐、宋类书除《吟窗杂录》节引数语外,余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事类赋注》等书均未见称引,而明清丛中则屡见采辑”(郭绍虞 108)。郭氏治学向以细致严谨著称,尤其注重清理基本文献。朱自清曾称许说:“第一个人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得推郭绍虞先生”(朱自清 545)。可见他在史料的发掘积累方面得到过同行专家的充分肯定。但在介绍《诗品》的流传过程时,显然也没有留意到《太平御览》曾经征引过其中部分条目。郭氏论著发表已在古直《诗品笺》出版之后,仍有如此疏漏,足证当时的《诗品》研究者对《太平御览》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

正因如此,古氏之说甫出,便立即得到不少人的赞誉和肯定。古氏弟子闵孝吉引述过前辈学者李详对此书的评价:“兴化李审翁云:‘《诗品笺》超出人表,无论旁参曲证,旨蕴毕泄,即文言名句,亦似六朝人笺疏之学’”(闵孝吉 36)。③李氏精熟《文选》,对陶诗也极有研究,对于古直的“新发现”想必会格外留意,“旁参曲证”云云或许就包含着对“陶公本在上品”之说的评价。可惜李氏著述多有散佚,已无从考察他对此有何具体评价。不过其哲嗣李稚甫因感念通家之谊而撰文表彰过古直的学术贡献,特别强调:“公愚先生曾撰有《锺嵘诗品笺》,根据《太平御览》的引文,陶渊明名次,本列上品,目前通行本,将陶潜列于中品,既非锺记室本意,亦与陶诗所体现的艺术价值不相称”(李稚甫 25)。或许能为了解李详本人的意见提供一些参考。

就在《诗品笺》问世的同一年稍后,当时兼任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教授的胡小石根据学生的课堂笔录,整理出版《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其中也谈及“陶诗品第”的问题:

把陶公置于中品的公案,后世人多有不平之鸣。关于此点,我倒有一桩小小的发见。就是锺嵘原来是把陶公置于

上品的,我的根据并不是近日流行的《诗品》的版本,乃在《太平御览》第五百八十六卷文学类引《诗品》的地方。明明上品列有十二人,陶渊明正是其中之一。《太平御览》为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所辑,所据书当为唐本或五代本。今本置陶公于中品,想来系北宋以后始如此,而且陶公的诗,颇合于锺记室所举的“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标准。(胡小石 80)④

虽然胡氏言之凿凿,但从时间上判断,极有可能只是直接采纳古氏之说。沪宁两地往来便利,在南京任教的胡小石要看到在上海出版的《陶靖节诗笺》或《锺记室诗品笺》,自然极为方便。课堂讲授毕竟不是个人研究,尤其是文学史之类的课程,不可能也不需要事必躬亲,偶尔参考借鉴一下旁人的成果也无可厚非。

紧随其后受到古直影响的是叶长青在1933年出版的《诗品集释》。尽管他在《自序》中指摘过《诗品笺》的疏失,但在“陶诗品第”的问题上则对古氏之说颇为赞同。该书《导言》中有《〈诗品〉序次之错乱》一节,特别提到:

今本《诗品》陶潜列在中品,而《太平御览》所引则在上品。[……]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遗篇旧制,十九不存。后世掇拾残文,颠倒序次,固所弗免,在读者善自究心耳。(锺嵘 叶长青 11a-b)

在“宋徵士陶潜”条下也径引《诗品笺·中品》里的案语(锺嵘 叶长青 36a),显然完全接纳了古直的意见,认为陶潜在《诗品》中原本就位居上品而非中品,今本“颠倒序次”,读者需要格外留意。

又隔了三年,方孝岳所著《中国文学批评》作为刘麟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八论》之一出版发行。这部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力作列有《单刀直入开唐宋以后论诗的风气的〈诗品〉》一节,在引述明清时人批评锺嵘品次不当的诸多意见之后评论道:

这些话,很难裁判的。《四库提要》

说：“梁代迄今，邈踰千祀，遗篇旧制，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残文，定当日全集之优劣。”这段话或者比较是持平之论。但《太平御览》五百八十六引锺嵘《诗评》（《隋书·经籍志》亦作诗评），原将陶潜放在上品。安知我们现在的传本，不是后人的窜乱呢？（方孝岳 刘麟生 51）

方氏此前曾受邀为古直的《层冰文略》题词，称其“襟抱雅飭，风力清远”，“机轴关键，原本《选》理；声情开阖，时睹唐贤；孤行侧出，每入宋室”（方孝岳 古直 1），可谓揄扬备至，足见两人交谊颇深。对于朋友的研究成果，他自然会注意借鉴。上引这段评述显然是依傍古说，甚至连最后的反诘也与古氏所言如出一辙。

除了胡小石、叶长青、方孝岳等公开接受、宣扬古直之说以外，私下对其称道首肯的也不乏其人。时任成都师范大学教授的庞俊，先前已经不满于锺嵘溯源品第之举，曾批评说：“仲伟之作，局于论诗，好谈源流，而难于质验，其所品第，亦多失次。如列魏武于下品，列陶公于中品”（庞俊 767）。陶潜位列中品，就在举证之列。因而在看到古直的“新发现”后，他当即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写道：

于唐侗风处见古直《诗品笺》，颇复明备。又据《御览》卷五百八十六证明陶潜本在上品，今本《诗品》在下品者，乃后人所窜乱。此条尤精。大抵校注旧籍，要必有如此者数事，乃可谓有功古人耳。（庞俊 769）<sup>⑤</sup>

文中提到的“唐侗风”即唐迪风。唐氏于1925年赴南京支那内学院访学，1927年返回成都，先后执教于成都大学、四川大学，至1931年5月因病去世。<sup>⑥</sup>由此推知庞氏寓目《诗品笺》当在其出版后不久。他不但称赏古直在这一点上能够发潜阐幽，而且将其著作奉为校注旧籍的典范，感佩钦敬之情溢于言表。庞俊当时正肆力撰著《国故论衡疏证》，对个中甘苦体会深切，绝不能视作空泛敷衍之论。

古直率先依据宋人所编《太平御览》，有力地

“证明”在《诗品》原书之中“陶公本在上品”，从而将萦绕在前代众多评论家心头的疑惑和不满一扫而空。由于立论之际有着看似无可辩驳的文献作为依据，因而在短短十年的时间内，这一“新发现”就迅速得到诸多同行学者的认可和附和。可是，问题真的就这样迎刃而解了吗？

## 二、是“后人窜乱”还是“明人妄改”？

古直的“新发现”将《诗品》中的陶诗品第从前人略带揣测的“宜在上品”坐实为确切无疑的“本在上品”，虽然得到很多同行的称扬，但也有一些学者持保留意见。钱基博在《锺嵘〈诗品〉校读记》中就不指名地批评道：

然魏武悲壮，范晔华贍，屈居下第；元亮清远，鲍照迢邐，不列上品：铨次未允，实为公论。顾或者谓《太平御览》五百八十六锺嵘《诗品》曰：“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知陶公之列中品，出后人窜乱也，则亦无解于魏武诸人。（钱基博 21-22）

钱氏以退为进，认为即便“陶公本在上品”之说能够成立，也无法自圆其说，消除前人对曹操、鲍照等人品第的责难，显然是针对古氏所云“以此推之，魏武下品，郭璞、鲍照、谢朓等中品，安保不是后人窜乱乎”而提出的商榷。这样的批驳无疑有转移重心、避实就虚之嫌，在实际论辩过程中收效甚微，并未引起古直及其诸多同调者的回应。

既然“新发现”的重要依据是《太平御览》中的引文，有些批评者就对此进行深入的追究复核。罗根泽《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在论述“论诗专家之锺嵘”时，也涉及到陶潜的排名问题，提出：“通行本《太平御览》卷五八六引列上品，但宋本仍列中品”（罗根泽 117）。罗著素以材料丰富、考订翔实著称，可惜此处因格于体例而语焉不详，只言及通行本与宋本存在差异，对于两者孰是孰非并未给予明确的评判。对此进行较为详尽考察的是汪辟疆，他在重新检核《太平御览》后指出：

余家旧藏明黄正色活字本《御览》，

文部五百八十六引锺嵘《诗品》。其上品十二家之末,下有陶潜二字,分注平列,张海鹏、鲍崇城二本同。颇疑元明间人不满记室平品,因除去古诗一家不计外,擅移中品之陶公于小注,以足十二人之数。此明人妄改古书之明证也。今日偶取涵芬楼景印宋本《御览》覆按之,果无陶潜,而以《诗品》评陶一条别行引之,益足取证。(汪辟疆 817)

通过比较《太平御览》传世诸本的引录情况,他判定古直所凭借的并非宋本旧刻,而是明清以来的刻本;并进而推断将陶潜列入上品诗人的名单之中,只是明人在刊书时妄改古籍所造成的结果。

依据宋本和通行本《太平御览》之间的差异,汪辟疆似乎很轻易地就能将古直驳倒。这难免让人怀疑古氏治学之粗疏、立论之草率,甚至连带地会对胡小石、叶长青、方孝岳、庞俊等诸多附和其说的学者也持有类似的想法。不过古直等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疏漏,实属情有可原,不宜过于苛责。自明代以来,《太平御览》便无精善之本。明人胡应麟说:“《御览》向行钞本,十年来始有刻,而讹谬特甚。非老师宿儒,即一篇半简,莫能句读。至姓名颠舛,世代鲁鱼。初学士读之,或取入诗文用,误人不渺”(胡应麟 467)。清初汪璐也提到:“此书[按:《太平御览》]与《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合璧事类》并为宋代所纂辑。彼三书者,今皆有善本,独此书无人校为重刊者”(汪璐 74)。可知当时通行的《太平御览》未经精心校勘,因而舛讹颇多。罗根泽、汪辟疆提到的宋本《太平御览》,要迟至 1935 年底才由商务印书馆根据日本所藏宋本,并以和刻活字本配补,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之中,予以影印出版。<sup>⑦</sup>此前在中国本土流传最广的仅有明黄正色本及清乾嘉以后的张海鹏本、鲍崇城本,尤以嘉庆年间的鲍刻本最为通行。鲍氏在刊刻此书时颇费心力,在卷首自序中曾略述始末:“余初得明人黄正色所刊及活字本,以为善。后见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严氏铃山堂各写本,行款多与宋雕相似,虽传写不及影抄精审,然较之明刻,则有霄壤之不同矣。嘉庆丙寅秋,余从宫保阮芸台先生假得是书,每遇暇日,细为雠校,凡阅二载而始毕。然不读写本,无以知明刻之谬;不见宋校,更无以知写本之亦未尽

善也。而世所传流仅存明刻,近时采辑家奉为枕中秘者,惟此而已,不知书中脱落,更仆难数,并有颠倒失其次序,全不足以搜讨,是未可依据第一陋册也。设无此本,将何以订其讹而存其真?”(鲍崇城“序”)。可知在付梓之前曾以阮元所藏宋本为主,并广泛参考明清两代钞本、刊本,详加甄别校雠。参与其事的阮元对此也极为看重:“故余所眷校者,以全依宋本不改一字为主。今鲍君崇城所刻,又皆全依余所校者付梓,且精校再三,不滋舛脱。足使艺林称快,后世委心,古籍古人,皆藉是更垂不朽矣”(阮元“叙”)。强调完全依据宋本,经过精心眷校。可阮元所藏实为何元锡钞合周锡瓚藏宋刻本,仅残存三百六十六卷,并不能完全呈现宋本原貌。<sup>⑧</sup>但鲍、阮两人所言,却很容易误导读者认为鲍刻本完全是据宋本直接翻刻而成的。

在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太平御览》出版之前,别说是普通读书人,即便是专业研究者,都很难亲眼目睹宋本真容。商务印书馆稍早之前曾出版过《太平御览索引》一书,依据的就仍是鲍刻本。其编者钱亚新认为“鲍刻可谓集宋刊、明刊、清刊之大成”,“本索引依此为根据者,盖亦因是故也”(钱亚新 20),给予鲍刻本很高的评价。从三十年代开始,哈佛燕京学社主持编纂了包括《太平御览》在内的一系列中国古籍的引得,因受条件限制,也只能依据鲍刻本进行编纂。主持其事的聂崇岐说:“故在今日而言《御览》通行诸本之较佳者,似已非鲍刻莫属。顷闻上海商务印书馆将有影印宋本《御览》之举,不知其所据者究为何时版本,此要待影印本出版时方得知其详矣”(聂崇岐 xviii)。<sup>⑨</sup>在他看来,在尚未了解宋本详情以前,将鲍刻本作为底本仍不失为较佳的选择。即便在影宋本《太平御览》出版之后,不少学者受条件所限,也并不能立即利用。余雪曼就感慨说:“至《太平御览》五百八十六列陶上品,次谢灵运后,显系后人所增。罗根泽先生说:‘宋本仍列中品。’其言自有据,惜余未尝见之”(余雪曼 2b)。尽管当时影宋本已经出版,他却仍然无法据以参验。由此看来,即便罗根泽、汪辟疆等人的判断无误,古直在立论时所凭借的《太平御览》只是明清时期的刻本,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对此应具了解之同情。况且,古直做出那样的误判,也属事出有因,不宜求全责备。一方

面,极有可能轻信鲍崇城、阮元等人所言,误以为鲍刻本体现的就是宋本的原貌。另一方面,无论是鲍刻本还是宋本,在开列《诗品》上品诗人的名单之后,紧接着都征引了其中五位诗人的评语,在曹植、刘桢、张协、阮籍等四位上品诗人之后,就是陶潜的评语。这样的征引方式本身就很容易滋生误解,令人联系起前面的那份名单,产生不应有的联想。

汪辟疆等人依据宋本《太平御览》来驳斥古直,固然显得振振有词,但就研究方法而言,双方其实并无差异,即都是借助宋人所编类书来进行考察。尽管在学术史上利用类书校勘而获得成功的例证屡见不鲜,但这种方法先天就存有缺陷。刘文典曾指出:“清代诸师校勘古籍,多好取证类书,高邮王氏尤甚。然类书引文,实不可尽恃。往往有数书所引文句相同,犹未可据以订正者。盖最初一书有误,后代诸书亦随之而误也”(刘文典 6)。强调不可轻易采信类书。关于这一点,汪辟疆其实也深有体会:“如宋《太平御览》,至明而始有重刊,黄正色活字本已多臆改,黄尧圃、顾千里又累窜易,务求其通。它日据此以校经传子史,将谓《御览》作某为可信乎?”(汪辟疆 56)。批评的虽然是明清刊本,可就算是宋刻善本,《太平御览》的编纂距离锺嵘撰写《诗品》之际也已相隔近五百年,站在古直等人的立场,完全可以就此反唇相讥:即使陶潜的姓名未见于宋本《太平御览》所开列的上品诗人名单,“安保不是后人窜乱乎”?

### 三、晋宋诗风与《诗品》义法

仅仅利用宋本《太平御览》来驳斥“陶公本在上品”的说法,显然未必完全行之有效,而且要做到这一点还需留待影宋本通行之后。没有亲眼目睹过宋本的学者只能对此进行推测假设,并不足以令人信服。因而另有学者别辟蹊径,尝试从晋宋之际的创作、评论风气入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讨。1935年出版的杜天縻《广注诗品》说:

锺氏之品第作者,不知何所依据;以近人观之,则列陶潜于中品,屈魏武于下曹,似未曲尽其当;岂以渊明之自然,孟德之豪放,非当时之所尚邪?(锺嵘 杜天縻 6)

还只是用揣度的语气来加以推断,并没有详细的分析论述。而汪辟疆在依据宋本《太平御览》反驳古直之后,又引录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对晋宋诗风的描述,对此做了进一步深究:

陶公笃意真古,貌枯神腴,在宋齐为旧格,与彦和所标举之宋初体制,迥不相侔。故时流亟推颜、谢,颇不重视陶公。颜延之、萧德施辈为文张之者,亦以节概皎然足以风世,非论其诗也。记室平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又云:“陶公文体省净,殆无长语,至于‘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其有意抑扬,语有分寸,亦未可与上品曹植、谢灵运诸家平品之语等量齐观也。(汪辟疆 817-18)

他结合刘勰所述晋宋时期的创作风尚,以及颜延之、萧统等人表彰陶潜的重心所在,来证明陶诗风貌迥异于时风,当时人推重陶潜更注重其品德而非诗才;而《诗品》对于陶潜的评价也明显带有节制,不能和上品诗人等而视之。这样的讨论就不仅仅是着眼于《太平御览》之类旁证,而是联系整个时代的风气嬗变来考察锺嵘对陶诗的认识。

耽嗜陶诗的逯钦立对于“陶诗品第”的问题也极为关注,在1947年发表的《锺嵘〈诗品〉校考》中认为:

陶潜不媚时流,世既难其质直(《诗品》),而人亦嫌其多酒(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虽昭明知文,独爱陶作;锺嵘为评,实难列之上等,何者,世俗嗜好之所限也。[……]然则锺嵘品第之允当,固知灼然有据矣。(逯钦立 59)

一年之后,他又修订此文,将这段内容改写成“后人所重之陶诗,在当时仅为别派,而非正宗。锺氏以私好置之中品则可,固不得置之上品矣。[……]今《御览》作十二人,而以陶潜夹注十一人之下,特好事者为之。如陶在上品,论时代不得在谢氏之下”(逯钦立 397-98),<sup>⑩</sup>其矛头所指就更为明显。逯氏当时正着手重新校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歌,对于六朝诗风的流变自然有相当真切

感性的认识。他同样强调陶诗虽受后世尊崇,但在当时并不具有代表性,因而鍾嵘绝无可能将其置于上品。他还附带提到,在明清时期刊刻的《太平御览》中,陶潜名列谢灵运之后,与时代先后不合,更能证明这是好事者后来添加上去的。<sup>①</sup>

类似的研究思路还见于伍叔悦的《文心雕龙札记》。伍氏长期在大学中讲授陶、谢诗及《文心雕龙》,对六朝文学创作及批评的总体趋势熟稔在胸。这部《札记》虽是作者于1952年在日本东京大学讲学时的记录稿,但相关的意见可能蓄积已久,其中说道:

六朝时期渊明只是一个远离世间风尚的诗人,并没有受到很高的评价。清代王士禛指责六朝的品味,在《诗品》中将陆机、潘岳列为上品,视渊明为中品,这一论断是无视六朝的品味。虽然好友古直(字公愚)指出引入宋本《太平御览》的《诗品》把渊明归为上品之列,我还是难以赞同。(伍叔悦 173)<sup>②</sup>

伍氏自1925年开始任教于中山大学(原名广东大学),与古直交好,却并未因私人交谊而赞同其新发现。可资参证的是其《暮远楼自选诗》中还有一首《读鍾记室〈诗品〉》:“记室文字佳,论诗有妙语。流别法刘班,家家溯其祖。[……]贬陶时所趋”(伍叔悦 44)。同样认为鍾嵘置陶潜于中品是受世风影响。尽管没有具体展开分析,但就论述角度而言,和汪辟疆、逯钦立大体相仿。

汪、逯、伍等人从大处着眼,优点在于将鍾嵘《诗品》置于整个六朝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背景之下,避免以偏概全的一隅之见;但缺点也不言而喻,即其前提是鍾嵘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必须服从顺应晋宋时期的诗坛风尚。这也容易遭到论辩对手的质问:难道鍾嵘就不能别树一帜,挑战当时普遍的审美观念吗?

因此,由最初的文献复核转向对时代风气的考察,依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再进一步从《诗品》自身寻找内证,来验证“陶公本在上品”之说是否可信。这一工作其实很早就有学者在尝试。在古直《诗品笺》问世后的第二年,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许文雨出版了《诗品释》,因为当时还未研读过古著,所以还没有涉及相关问题,只在卷首

《刊言》中略言其撰述目的:“予诚恐今世复有谢茂秦、王渔洋辈纷纷为皮相之论,无由起仲伟千年就堙之旨也,故亟释之,俾学者无惑焉”(鍾嵘许文玉 2)<sup>③</sup>。对明清时人苛责《诗品》颇致不满。此书于1938年经过修订,改题为《鍾嵘诗品讲疏》。修订本不仅附有《评古直〈鍾记室诗品笺〉》,对其得失做了较为全面的评述,在正文中更针对“陶公本在上品”有直接的批驳:

《渔洋诗话》曰:“陶潜宜在上品。”案本品所次,历受人议,实则记室绝无源下流上之例,故应、陶终同卷也。又《文选》收陶诗独少,则时议亦有所限云。《太平御览》刊上品末一人,虽陶潜名,显系后人添入,果属原有,何至次谢灵运下,适形其风尚陶诗为宋人之见而已。(许文雨 85-86)

除了参酌《文选》所录陶诗数量,并质疑陶、谢排名先后之外,许文雨的意见中有一点尤其值得重视,即指出《诗品》体例谨严,鍾嵘既然认为陶诗“源出于应璩”,而应璩被置于中品,因此陶潜绝无可能躐等而跃居上品。相较于前述各家的考论,许氏已经注意到《诗品》自身的撰著体例,虽然还没有作具体剖析,但已经显得独具只眼。

与许文雨研究视角相似,同样注意到鍾嵘在推溯源流时应该遵循某种规律的还有王叔岷。他在1948年发表的《鍾嵘评陶渊明诗》中说:

鍾嵘既谓陶诗源出应璩,应诗列在中品,则陶诗仅当在中品。列某人之诗于上品,而谓其源出于中品某人之诗,《诗品》无此例。故《御览》引陶诗在上品,疑经后人改窜,非《诗品》之旧也。(王叔岷 68)

认为如将陶潜由中品移置上品,将有悖于《诗品》的体例,因此不能仅仅依据《太平御览》就率尔认定陶诗本在上品。在三年后发表的《鍾嵘诗品疏证》中,他又重申这一意见:“仲伟以陶公源出应璩,璩列中品,故陶公亦列中品。《御览》五八六引《诗品》,陶在上品,盖出于臆改。古直反谓:



‘今传《诗品》，列之中品，乃后人窜乱之本。’非也”（王叔岷 667）。王叔岷的论述虽然较许文雨所言稍显具体，可仍未着眼于《诗品》全书，对其撰述体例进行周详细致的讨论，因而很难轻而易举地取信于人。方孝岳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就说：“实在《诗品》所推流别，不尽可信；但古人的作品，散亡很多，也难以实证”（方孝岳 51-52）。直接对锺嵘追溯源流之举的可信度表示怀疑，又怎会轻易接纳许文雨、王叔岷研讨的结论呢？而陶诗源出应璩又是另一桩聚讼纷纭的公案，南宋叶梦得说应璩之作“与陶诗了不相类”（叶梦得何文焕 433），清代王士禛认为《诗品》追溯陶诗渊源“尤陋矣，又不足深辩也”（王士禛 丁福保 204），近人陈衍更是指责锺嵘“评宋徵士陶潜云：‘源出应璩。’何止梦呓”（陈衍 卷中）。一旦牵扯到这个话题，势必会引发其他的争议。即使是傅庚生那样并未置疑陶潜当位居中品的学者，对于许文雨从《诗品》撰述体例入手来进行研讨也颇不以为然，他在《〈诗品〉探索》一文中引述了许氏的相关意见，随后批评道：

但源下流上，关涉尚小；倘潜果有居上品之实者，未尝不可云其源出于《国风》或《古诗》以就之也。且后世于陶出于应，方多疑难，执此以为口实，亦不足以服诤议者之心耳。（傅庚生 8）

由此不难发现，即使是在同样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之间，对于是否应从《诗品》撰述体例着眼来讨论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傅氏所言实与前人的批评一脉相承，虽然显得疑古过度，甚至不免强词夺理，但也和许、王等人没有深入论述，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有关。

受到前述诸家批评意见的启发，钱锺书后来居上地对“陶诗品第”的问题做出最为深入周详的考述。在1948年出版的《谈艺录》中有“陶渊明诗显晦”一节，钱氏在其中提到“近有笺《诗品》者二人，力为记室回护；一若记室品诗，悉本秤心，成此铁案，无毫发差，不须后人作诤友者。于是曲为之说，强为之讳，固必既深，是非遂淆。心劳力拙，亦可笑也”（钱锺书 107），<sup>⑩</sup>而他们依据的正是《太平御览》，并由此宣称陶潜本在上品，今本《诗品》乃遭后人窜乱。钱氏对此说力予辩驳，分

别从文献校勘、时代风尚以及撰述体例三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在文献校勘方面，他指出“余所见景宋本《太平御览》，引此则并无陶潜”（钱锺书 107）；在时代风尚方面，他认为锺嵘评诗“与渊明之和平淡远，不相水乳，所取反在其华靡之句，仍囿于时习而已”（钱锺书 109），都点到即止，并未深究。其研讨重点主要放在探究《诗品》的撰述体例之上，也就是所谓“不烦傍引，即取记室之书，以破厥说”（钱锺书 107-08）。钱锺书认为：“记室论诗，每曰：‘某源出于某。’附会牵合，叶石林、王渔洋皆早著非议。然自具义法，条贯不紊”（钱锺书 108）。指出《诗品》在追溯诗人源流时虽然不免牵强附会，但就其本身而言，却是自具章法，有条不紊。随后通过具体举证，极为细致地归纳出《诗品》在追溯源流时所遵循的几条基本规则：“有身居此品，而源出于同品之人者”，“有身列此品，而源出于上一品之人者”，“有身列此品，而源出于一同品、一上品之人者”；“若夫身居高品，而源出下等，《诗品》中绝无此例”（钱锺书 108）。最后再根据这一撰述体例，重新考虑“陶公本列上品”的问题：

使如笺者所说，渊明原列上品，则渊明诗源出于应璩，璩在中品，璩诗源出于魏文，魏文亦祇中品。譬之子孙，俨据祖父之上。里名胜母，曾子不入；书称过父，大令被讥。恐记室未必肯自坏其例耳。[……]不知其人之世，不究其书之全，专恃斟酌异文，安足以论定古人。况并斟酌而未备乎。（钱锺书 109）

许文雨、王叔岷等只是提及《诗品》“绝无源下流上之例”，而且局限于讨论陶潜与应璩之间的源流关系，并未就《诗品》义例作全面细致的考察，因而显得较为笼统。钱锺书则首先统观全局，条分缕析地总结出《诗品》的体例义法；然后以此为参照，细致梳理由魏文帝曹丕至应璩再至陶潜这一系诗人的承传关系；在此基础上又辅以文献校勘、时代风尚等相关证据，最终彻底批驳了“陶公本居上品”的谬说。面对如此坚确不移的证据，古直及其同调者恐怕也无法辩白了。

#### 四、馀波不断的论争

依照常理,在钱锺书论定“陶诗品第”之后,相关问题可谓阐发殆尽,再无疑义了。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陶公本在上品”的谬说并未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被不少人信从援引。牟世金在六十年代初发表《锺嵘的诗评论》,在讨论其品评标准时说:“从锺嵘所品不当之处来看,如曹操、陶潜(《太平御览》文部诗之类谓陶原属上品)、鲍照等过低,陆机、潘岳、刘桢、谢灵运等人过高,他所依据的,似乎主要是这些人诗歌的表现形式”(牟世金 10)。<sup>⑤</sup>文中自注就透露出他对相关批评意见还不清楚,或是虽有了解而并未接受吸取。而五六十年代问世的一些《诗品》注本,更是直接承袭古直等人的意见;尤其是陈延杰的修订本《诗品注》,进一步扩散“陶公本在上品”的错误观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陈著早在1927年就已出版,只是考订未精,舛讹颇多。但在初版中,陈氏还只是说:“彭泽之豪放,当列上品”(陈延杰 1927: 1)。<sup>⑥</sup>“王士禛曰:彭泽宜在上品。余甚然之”(陈延杰 1927: 25)。虽然认同陶潜“宜居上品”的看法,却并未怀疑今本《诗品》曾遭后人篡改。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陈氏着手修订旧著时,却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补了如下一段内容:

《太平御览·文部》诗之类曰:“锺嵘《诗评》曰:‘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是陶诗原属上品。迨至宋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題》,则云上品十一人,是又不数陶公也。王士禛曰:‘彭泽宜在上品。’余甚然之。(陈延杰 1958: 29)

《诗品注》初版问世不久就受到古直等人的讥评,时隔三十年改弦更张,当然要参考借鉴旁人的批评。这段针对“陶潜品第”的补充意见显然承袭自古氏之说,只是未能明辨是非,反而显得画蛇添足。修订本《诗品注》于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1961年改版付梓,之后又多次重

印,至今仍是发行数量最为庞大、传播范围最为广泛的《诗品》注本,致使后来诸多研究者直接受到误导。甚至到了八十年代初期,还有学者据此立论:“锺氏将陶潜抑置中品,不但毫无道理,而且与他自己的评语也是矛盾的。其实,这难以解释的现象竟是一场误会,陈延杰已经发现了其中症结所在。[……]这里根据北宋时的《太平御览》所载,可以肯定锺氏《诗品》中陶诗原属上品”(许总 89)。变本加厉地根据陈氏的误判来加以论述。出现同样错误的并非个别学者,<sup>⑦</sup>追根溯源,都是由于误信了修订本《诗品注》。除了陈延杰之外,汪中在六十年代末出版的《诗品注》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他虽然参考过许文雨《诗品讲疏》等论著,但在陶潜条中依然征引古直《诗品笺》的说法,<sup>⑧</sup>并未有任何批评或说明,隐约可见他对争论双方的取舍态度。

可以肯定的是,牟世金、陈延杰、汪中等学者显然都没有留意到钱锺书在《谈艺录》中的意见,否则绝不会继续沿袭、传播这一错误观点。这或许是因为钱锺书在当年学术界的声望,还远远不如后来那样足以形成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因而《谈艺录》的出版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年的一篇书评,在礼节性地称赞钱著能够“沟通中外,参酌人我,论切肯綮,而言有据凭”之后,逐一指摘其中存在疏于辨正、造语失贴、征引未周、文有脱误、诠释欠妥、评语自相矛盾、注或衍或漏等诸多弊病(阎简弼 271-83),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此外,《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6月,虽然次年7月又曾再版,但随后世事纷纭,时局变换,直至1984年才得以补订重印,中间几近四十年的空白也直接导致其他学者鲜能参酌其论说。

当然,自五十年代以后,仍有不少学者在继续批驳“陶公本在上品”的观点,而且主要是一些海外汉学家,可见这场争论正在逐渐扩大其范围及影响。日本学者中沢希男在1959年发表《〈诗品〉考》,提到在日本安政二年(1855)刊行的学训堂仿宋本《太平御览》中,“‘谢灵运’下无‘陶潜’二字,根据管见所及,‘陶潜’二字恐为后人窜入”,并认为:

学训堂本“谢灵运等十二人诗皆在上品”后,载有对曹植、刘桢、张协、阮籍、陶潜的品评。《御览》从“古诗”开

始,至“谢灵运”结束,其次序,亦与今本《诗品》所评诗人次序相同。其中,如果“古诗”不计算在内,则与“十二”之数不合。这“十二人”,或者就是“十一人”之误。(中沢希男 曹旭 154)

前引汪辟疆《读常见书斋小记》已经提到:“颇疑元明间人不满记室平品,因除去古诗一家不计外,擅移中品之陶公于小注,以足十二人之数”(汪辟疆 817)。涉及到“十二人”具体所指的问题,但并未予以深究。中沢希男对《太平御览》中所说“十二人”是否包括“古诗”也颇有疑问,为了使具体名单与人员数字相互吻合,便大胆推测“十二人”或为“十一人”之误,其实并没有确凿的证据。韩国学者车柱环在六十年代出版的《锺嵘诗品校证》中也针对古直进行过批评:

清鲍刻本《御览》“灵运”下双行注“陶潜”二字,乃不知所云十二人包括《古诗》之无名氏,而因尊陶观念妄以陶潜充数。得影宋本《御览》之铁证,则陶潜本在《中品》之疑案可得定论矣。(车柱环 46)<sup>⑩</sup>

主要依据影宋本《太平御览》来驳斥古直,同时提出所谓“十二人”当包括创作《古诗》的无名氏在内,这就使具体名单和人员数字能够对应无误,无形之中也回应了中沢希男的疑问。法籍华裔学者陈庆浩在七十年代撰《锺嵘诗品集校》,在《导论》部分也对古氏之说持批评态度:

若陶潜果于上品,则应在谢灵运前。且全部合计应为十三,而非十二人。古直所据为鲍刻《御览》,“陶潜”二字双行注于谢灵运后,今检四部丛刊影宋本《御览》此段,无此二字。是知陶潜之名为后人添入者。可见当时崇尚陶诗,而后人竟不惜改易《诗品》以就之一例。陶渊明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极大影响,自是无可置疑。然在锺嵘之时代,似乎陶诗则似仍未备重视。(陈庆浩 27)<sup>⑪</sup>

在利用影宋本《太平御览》并联系时代风气进行研讨之余,也同样注意到如果把陶潜置于上品,则名单中的人数将达到十三人,而非十二人。有鉴于尚有不少学者仍在信从乃至传播“陶公本在上品”的错误观点,对此予以适当的批驳自然是必要的。只是综观上述各家论说,虽然关注到名单人数的问题,但毕竟无关宏旨,所提供的主要证据其实并未超出前人范围,而且似乎也都没有注意到钱锺书在《谈艺录》中的相关论述。

这种情况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依然如故,例如杨祖聿的《诗品校注》在参考了许文雨、车柱环等人的意见之后说:“重谢不重陶,乃其时风尚,当非嵘一隅之见。反观仲伟于陶之赞词,实得三昧,泛语空言,何能致之,又何庸介介乎其品列之上中乎。又渊明源于应璩,应入中品,陶亦当入中品,此仲伟品第之则,绝无源下流上之例焉”(杨祖聿 121)。所讨论的内容也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尤其是有关《诗品》体例方面的分析,依然只是停留于说明其“绝无源下流上之例”,因而在批驳过程中也就稍欠周详。

另有一些学者集中研讨“陶诗源出应璩”的问题,对于深入理解锺嵘推溯源流时所遵循的义例也颇有参考价值。例如王叔岷在 1975 年发表的《论锺嵘评陶渊明诗》中提出:“锺氏所谓‘源出’,乃就体裁相似而言。[……]据残存之应诗,与陶诗比较,可证陶诗非仅体裁与应诗相似;即词句、命题,有时亦受应诗影响”(王叔岷 529-30)<sup>⑫</sup>。王运熙在 1980 年发表《锺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解》,认为:“《诗品》谓陶潜诗其源出于应璩,是说陶诗的体貌源于应璩。”并进一步分析两家诗歌的共同特色,“其一是语言通俗、口语化,有时还带一些诙谐的风趣”,“其二是喜欢用通俗的语言说理发议论”(王运熙 136-37)。虽然他们并没有直接讨论“陶诗品第”的问题,但通过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也有助于廓清前人对锺嵘所述陶诗渊源的误解,加深对《诗品》体例义法的领会。

整场论争的真正终结则要等到八十年代中期,随着《谈艺录》补订重印,特别是钱锺书的学术地位日渐提升,他在四十年前针对“陶诗品第”问题的论述又重新为人关注。颇具代表性的是王运熙、杨明合撰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在涉及“陶诗品第”的问题时说:“从锺嵘以至当时

其他文人的品评标准看,陶潜只能列在中品。再从《诗品》义例看,某家诗源出某家,只能源出上一品或同一品的某家,而不能源出下一品的某家。《诗品》说陶潜诗源出应璩,应璩诗又源出曹丕;应璩、曹丕均在中品。如果陶潜列于上品,而源出于中品的应璩,这是不符合《诗品》的义例的。何况《御览》引文也没有说陶潜置在上品”(王运熙 杨明 529)。显然参酌过《谈艺录》中的相关内容。王运熙在《研读古代文学须明其义例》一文中更是明确说道:“有的《诗品》研究者根据《太平御览》一本的引文,说《诗品》原把陶潜置于上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诗品》的义例,上品之人不可能出于中品。《诗品》认为陶诗源出应璩,应璩在中品,陶潜当然不可能属上品。这个问题,就是依据《诗品》全书义例得到澄清的(参考钱锺书先生《谈艺录》)”(王运熙 8)。可见钱锺书的意见在学界已逐渐形成共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至此终于可以落下帷幕了。

## 五、从“陶诗品第”之争看现代学术研究的转型

尽管这场论争的起点最终被证明是因为引据有误而造成了无的放矢,尽管这场论争的后半程由于未能及时了解研究动态而出现了倒退和重复,但围绕着“陶诗品第”的话题,众多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展开了一系列往来交锋,确实提出了很多颇具价值的意见。即使“陶公本在上品”的观点被彻底否决,但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毫无意义,它促使学者们对《诗品》的版本源流与体例义法,锺嵘的诗学观念与品评标准,乃至陶诗在流传与接受过程中的种种复杂情况都做了极为深入细致的研讨,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多借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发表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在介绍《诗品》版本时说:“《诗品》一书,宋以前淹晦无闻,明代以后,始渐显于世,故唐宋类书,除《吟窗杂录》《太平御览》等节引少许外,余多未见称引,而明清丛书则屡见采辑”(牛懋庸 1)。行文显然参考过前引郭绍虞《诗话丛话·锺嵘〈诗品〉》及《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论述,而又特别增加了有关《太平御览》的内容,无疑是受到这场争论的影响而做出的补充。

重新回顾这桩公案的因果始末,对于审视现

代学术研究的发展迁变而言,也提供了一个异常生动鲜明的例证,带来不少耐人寻味的启示。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参与这场辩论的学者前后有二十余人,而且相互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对于这场论争的深入展开颇有影响。例如钱基博与叶长青在1930年至1936年间同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sup>②</sup>在此期间先后发表议论而又观点相左。叶长青早年从学于陈衍,并在1931年介绍陈氏至无锡国专任教。<sup>③</sup>陈衍所撰《锺嵘诗品平议》在当时极有影响,许文雨在《〈诗品平议〉后语》中曾评价说:“陈氏以当世谈艺之耆宿,抗颜与记室争直,勒成《平议》一书,悍然论证,诤而不阿”(锺嵘 许文雨 162)。叶长青在无錫国专时讲授过《诗品》,与其师承渊源当不无关联。而陈衍对钱基博之子钱锺书又格外赏识,在1935年时与钱锺书有过一席闲谈,无意中提及:“叶长青余所不喜,人尚聪明,而浮躁不切实。[……]新撰《文心雕龙》《诗品》二注,多拾余牙慧”(钱锺书,《石语》43)。由此可见,钱锺书后来之所以会对这个问题产生浓厚兴趣,立论时又能别具卓识,除了自身天资过人、博闻强识之外,既得益于家学熏染,又受惠于交游闻见,使他在正式参与讨论之前对于相关情况早有了解,在充分吸取、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酝酿。

以大学为核心的现代学术机构也为这场争论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极佳的平台,使得诸多参与者既能各守专攻,又能切磋交流。除了钱基博与叶长青同时在无錫国专任职之外,古直与方孝岳在1933年至1938年间都在中山大学任教;<sup>④</sup>胡小石、汪辟疆和陈延杰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都在中央大学共事,胡、汪此后还一直留任,而罗根泽从1940年后也至此执教;<sup>⑤</sup>逮钦立与王叔岷于1941年至1949年期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学、共事。<sup>⑥</sup>还有一些学者先后辗转于不同大学之间,如伍叔愷相继在中山大学(1925至1930年)、中央大学(1931至1936年、1939至1948年)、台湾大学(1949至1952年)等校任教,和古直、胡小石、汪辟疆、王叔岷等学者都有过学术交流。<sup>⑦</sup>绝大部分学者在治学之余还承担着教学授课的职责,像陈延杰《诗品注》、许文雨《锺嵘诗品讲疏》、叶长青《诗品集释》等原先都是授课的讲义;个别受教的学生之后也陆续参与到争论之中,师生之间教

学相长,也不断扩大这场争论的范围和影响。例如韩国学者车柱环在六十年代曾赴台湾大学留学,受知于王叔岷等人,在校证《诗品》的过程中也常与王叔岷往还讨论。<sup>②</sup>其《锺嵘诗品校证》深得王氏赞赏,后者在《论锺嵘评陶渊明诗》中曾回忆说:“二十三年前,岷疑古氏所据《御览》,乃经后人改窜。得车说之印证,可谓不虚矣”(王叔岷 529)。而跟随车柱环研习过《诗品》的另一位韩国学者李徽教,在六十年代末又至台湾大学攻读硕士,在其学位论文《诗品汇注》中也曾依据许文雨、王叔岷、车柱环的论述,继续批驳过古直(李徽教 147)。王叔岷对李徽教也极为称许,在其《锺嵘诗品笺证稿》中“多引其说,略表惜才之意”(王叔岷 2)。由此可见,这些在现代学术机构中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无形之中已经构成了一张上下勾连、纵横交错、异常复杂的关系网,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声气相通的学术共同体,使得交流治学心得、传递学界动态、了解研究成果等都尤为便利。虽然各家意见并不一致,但彼此援引发明,相互质疑问难,使得这个学术共同体内部具备良好的互动机制,极大地促进了研究的深入细化。

置身于学术共同体之内,对于继续展开研究自然带来极大便利;而一旦被排除在外,则难免会造成不少负面效应,甚至因此而滞后于整体的学术进程。最能证明这一点的莫过于陈延杰。陈氏《诗品注》初版之中错谬颇多,不仅遭到古直等人的严厉批评,“此事还增加了同事胡小石、陈中凡对他的轻视,此后命运一直不好,失业在家,靠卖文和救济度日”(曹旭 237)。<sup>③</sup>1936年中央大学国文系遵照教育部命令进行裁员,陈延杰就在被裁名单之中,<sup>④</sup>由此被抛出学界。直至五十年代末才重操旧业,修订增补旧作。但因长期疏离于学界,对研究现状不甚了了,相继被当年的批评者古直以及老同事胡小石误导,并直接导致后来的谬种流传。

通过这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论争,还可以发现在从传统诗文评转向现代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也在逐步发生相应的转变。相较而言,传统诗文评注重赏鉴体悟,更偏于感性;现代学术研究则强调评析裁断,更趋于理性。在这种分歧的背后,凸显出来的正是研究者身份的转换。对于绝大部分传统评论家而言,论诗衡文只是载道言志以外的余事,并未将其视为毕生志业;而在现代学术机构中工作的专业学

者则截然不同,受到职业化趋势的影响,其研究视角、考察方式势必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关于这一点,许文雨早就隐约有所觉察,他在《评古直〈锺记室诗品笺〉》一文中曾直言不讳地说:

古君此《笺》,实宗《文选》李善之《注》,条记旧文,堪称闳蕴。而于“释事忘意”之讥,恐亦难免。盖凡一切批评书之注释,自以妙解情理、心识文体为尚。宜坚援批评之准绳,而细考作品之优劣,此其事之不能踵李《注》而为者至为明灼。况《诗品》要旨,端在讨论艺术之迁变,与夫审美之得失,安有舍此不图,而第征引典籍,斤斤于文字训诂间,以为已尽厥职乎?自斯义不明,如《文心雕龙》诸注家,辄致力于字句之疏证,而罕关评见之论析,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治《诗品》者,苟不翻然变计,则亦前车之续而已。(锺嵘 许文雨 157)

指出古氏追摹效法唐人李善的《文选注》,尽管在文字校勘、词句溯源等方面旁征博引,考订细密,但在研究视角和考察方式上依然存在局限,难以避免“释事忘意”的弊病。由此强调研究《诗品》一类的评论性著作,不能停留在文献考索的层面,还必须深入阐发其旨趣义理。从“陶诗品第”的讨论来看,古直用看似无可辩驳,实则仅是单文孤证的《太平御览》来证成己说,恰如许文雨批评的那样,只是依靠“征引典籍,斤斤于文字训诂间”,而不是去力求“妙解情理,心识文体”,这无疑会直接影响到最终结论的准确。而许氏在论辩中率先考虑到《诗品》“无源下流上之例”,正是在探寻作品内在义理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尝试。对于许氏所倡导的转换研究范式,傅庚生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在《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书旨与序目》中说:

自有清一代迄于今,世尚朴学,探讨文学者亦几乎以考据为本,若就文以论文,辄必震惊群目,甚至腾笑众口;本末之所在,久其蒙然,买椟而还珠者,宜不少矣。(傅庚生 xi)

对清代以来崇尚考据的学术传统加以反省,认为

不宜简单地将其移用于研治文学。随即引述上述许文雨的那段议论,引申评论道:“此见实先于我。愚以为品鉴艺术之士,当依此为圭臬矣,不徒治《诗品》然也”(傅庚生 xi-xii)。对许氏所言深表赞许,认为应该针对文学自身的特性去品评鉴赏。特别强调日后研究文学都应当以此为准则,而不能仅限于《诗品》研究。

在“陶诗品第”的问题上持相反意见的一些学者,其实也已经迫切感觉到转变研究方式的重要性。方孝岳在《中国文学批评·导言》中开宗明义就提到:

至于各种批评之发生,都各有他所以发生的机缘,和他针锋所指的对象,并且各有个人学问遭际上的关系。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地方弄清楚,执着人家片面之言,认为一成不变的定论,那也会发生误会的。[……]所以我们对于一切言论,都应当从四面八方来活看才好,对于各种批评的“旁因”,不可不研究咧。(方孝岳 3-4)

所指明的各种考察角度如“机缘”“对象”“关系”等等,都不是仅靠文献考据就能解决的,而需要研究者旁搜远绍,深入腠理,仔细寻绎。只是在观念上虽然已经有了转变,甚至想要匡时救弊,但付诸具体实践,却并不一定能够立竿见影地取得理想的效果。至少在“陶诗品第”的问题上,方孝岳并没有对钟嵘如此品第的缘由进行全面细致的探究,只是追随古直,依据《太平御览》的引述情况来做出判断。可见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牵制,学者们还时常会不自觉地囿于以往的思维定势,很难在短期之内使研究范式得到彻底转变。

近现代以来学术风气丕变,但传统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式还是凭借强大的惯性,延续到以大学为核心的现代学术机构之中,对于身处其间的学者带来很大影响,最为显著的结果之一就是直接导致大学文科教育的发展失衡。身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对此深有感触,他在三十年代初就批评说:“研究中国文学又可分为考据,鉴赏及批评等。从前做考据的人认文学为词章,不大愿意过问;近年来风气变了,渐渐有了做文学考据的人。但在鉴赏及批评方面做工夫的还少。旧

日文献涉及这方面的大抵零碎琐屑,不成片段,发挥广大,是现在人的责任”(朱自清“中国文学系概况”18)。尽管寄希望于当时的学者能将重心转移至鉴赏、批评,但在现代学界提倡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的风潮带动之下,这种注重考据的风气只会愈演愈烈。到了四十年代初,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程会昌(程千帆)对于中文系独尊考据的发展状况更为忧虑:“方今大学中文之课程,经史子集,靡不在内。教学方法,自亦各有不同。然以考据之风特甚,教词章者,遂亦病论文术为空疏,疑习旧体为落伍,师生授受,无非作者之生平,作品之真伪,字句之校笺,时代之背景诸点”(程会昌 3)。从中不难发现,作为最重要的现代学术机构,大学固然能为学者们提供良好的专业研究场所,但与此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学术视野。就这场围绕“陶诗品第”展开的纷争而言,大部分学者之所以更习惯于从文献考订入手,而相对忽视对《诗品》体例义理的阐发分析,与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应该也不无关系。

亲身经历过这场“陶诗品第”之争的学者,对此自然更有发言权。钱锺书于1978年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出访意大利,在一篇题为《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演讲中,他回顾了晚近以来的学术风气,指出因为受到传统朴学和外来实证主义的交互影响,导致“只有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才算是严肃的‘科学的’文学研究。一切文学批评只是‘词章之学’,说不上‘研究’的”,“就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也无可讳言,偏重资料的搜讨,而把理论的分析 and 批判放在次要地位”(钱锺书 179-80)。⑧恰可印证朱自清、程会昌(程千帆)两位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钱锺书在演讲中特别强调:

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钱锺书 179)

虽然充分肯定整理、考订文献资料的必要性,但又指出考据仅仅只是手段和途径,最终还必须把文学放在首要位置,将焦点集中于理论的剖析研讨

之上。尽管这番议论针对的并不是《诗品》中“陶诗品第”的问题,但对于理解这桩公案背后所呈现的研究范式转型而言,无疑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古直、胡小石、叶长青、方孝岳、庞俊、陈延杰、汪中等人之所以不约而同地相信“陶公本在上品”,而中泯希男、车柱环、陈庆浩等人在问题早已解决的情况下之所以还依然执着于根据宋本《太平御览》来予以驳斥,都足以说明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注重文献考据的风气炽盛,积习难改。只是这样的往复纠缠,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钱锺书虽然也借助版本、校勘等方法,但因为发现争议的症结所在,所以更侧重对《诗品》撰著义例和理论体系的剖析,再联系时代风尚来进行研讨,最终才得以直探本源,阐幽抉微,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通过考察这桩公案的始末原委,具体而微地展示了现代学术研究在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特征,带给我们的启示应该已经远远超出了“陶诗品第”这个问题本身。

#### 注释 [Notes]

- ① 《申报》(上海版)曾于1929年1月23日及4月28日连续刊登同样的广告,对古直的一系列著作进行宣传。
- ② 咸丰年间张锡瑜校注的《锺记室诗平》虽已利用《太平御览》来校订《诗品》本文,但内容颇为简略,且流传未广,知者寥寥。
- ③ 李详字审言,故闵氏文中尊称其为“李审翁”。
- ④ 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原由上海人文出版社于1928年出版。
- ⑤ 原书排印时将“古直”误植为“古真”,现径改正。
- ⑥ 参见唐端正《唐君毅先生年谱》,载《唐君毅全集》第二十九卷《年谱 著述年表 先人著述》,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第3—4页。
- ⑦ 参见张元济《宋本及日本聚珍本〈太平御览〉跋》,载《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53—56页。
- ⑧ 参见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1页。
- ⑨ 聂崇岐《太平御览引得序》作于1934年12月16日。
- ⑩ 逯钦立《〈诗品〉考实》撰于1948年9月,原稿现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作者生前未曾发表。
- ⑪ 逯钦立的这一观点当是受许文雨《锺嵘诗品讲疏》的启发,参见下文所引许氏之说。
- ⑫ 参见滕堂明保、片冈政雄、近藤光男合编《伍叔悦教授讲义概要·文心雕龙札记》,原为1954年日文油印本,引文据张以译、殷婴宁审校中译本。按:古直并未说自己依据的是宋本《太平御览》,伍氏此处记忆有误。
- ⑬ 许文玉即许文雨,为行文便利,本文统称许文雨。
- ⑭ 钱锺书批评的“近有笺《诗品》者二人”,其中一位指古直,殆无疑问;另一位则尚待详考。今人多以为是指陈延杰(如曹旭《诗品研究》),恐怕并不准确。因据钱氏所述,那位笺注者“所引《御览》独漏却”“今本上品之张协”,而陈延杰《诗品注》并不符合这一点,且其修订版出版于1958年,时间也在《谈艺录》出版之后。
- ⑮ 牟世金此文后经修订,收入其所著《雕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时,已经删去“《太平御览》文部诗之类谓陶原属上品”,可见其后观点有变。
- ⑯ 陈延杰此序在1961年的修订本中被改为跋,置于全书卷末。
- ⑰ 另如葛景春《关于曹操等人在诗品中的品第问题》(《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也说:“《诗品》现传本中将陶潜置于中品,其实是版本流传中发生讹误所致,本非锺嵘过错。今本已非锺嵘原本之貌。”并引述陈延杰、许总等人的意见作为依据。
- ⑱ 参见汪中《诗品注》,台北:正中书局,1969年,第157页。
- ⑲ 车柱环《锺嵘诗品校证》最先发表于1960年韩国高丽大学《亚细亚研究》第三卷第二号,至1967年才与后续研究成果一起结集出版。
- ⑳ “未备重视”疑当作“未被重视”。
- ㉑ 王叔岷的这篇《论锺嵘评陶渊明诗》,原载1975年《文物汇刊》创刊号,与前述王氏于1948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同题,但内容颇有差异。
- ㉒ 参见傅宏星《钱基博年谱》,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京华《叶长青学术事迹述论》,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 ㉓ 参见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民国二十年辛未六十七岁”条,无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年。
- ㉔ 参见古成业《古直年谱述要》,载古小彬、古向明主编《国学家古直》,香港:香港新闻出版社2008年;李新魁《方孝岳先生的治学方法》,载《学术研究》1983年第1期。
- ㉕ 参见谢建华《胡小石先生年谱》,载郭维森编《学苑奇峰——文学史家胡小石》,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马驩程《汪辟疆先生传略》,载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古典文献研究》1989、1990年合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延杰生平传略》,载《文教资料》1986年第6期;《罗根泽先生年谱简编》,载马强才编《罗根泽文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 ㉖ 参见李思清、逯弘捷编《逯钦立先生年谱初稿》,载《逯钦立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王叔岷《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 ㉗ 参见方韶毅《伍叔悦年谱》,载《伍叔悦集》,合肥:黄山

书社,2011年。

⑳ 参见车柱环《〈锺嵘诗品校证补〉引言》,车柱环《锺嵘诗品校证》,第63页;王叔岷《慕庐忆往》,北京:中华书局,第98—99页。

㉑ 此说出自陈氏之子陈鸿询,参见曹旭《诗品研究》,但曹著原文误以“胡小石”为“吴小石”,现径改正。

㉒ 参见吴梅《吴梅全集·日记卷》“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46页。

㉓ 钱氏英文讲稿题作“Classical Literary Scholarship In Modern China.”收入《钱锺书英文文集》(A Collection of Qian Zhongshu's English Essays),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398—402页。

###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鲍崇城:“《太平御览》序”,《太平御览》,李昉等纂、鲍崇城刊刻。清嘉庆刻本。

[ Bo, Chongcheng. “The Preface of *Taiping Yulan*.” *Taiping Yulan*. Ed. Bo Chongcheng. Jiaqi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

曹旭:《诗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Cao, Xu. *A Study of Tastes of Poetr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1998. ]

陈衍:《锺嵘诗品平议》,民国年间石遗室刻本。

[ Chen, Yan. *Remarks on Zhong Rong's Tastes of Poetry*. Shiyishi Pres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

程会昌:“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国文月刊》(16)1942: 2—4。

[ Cheng, Huichang. “The Problem of Curriculum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Chinese Literature Monthly*(16)1942: 2—4. ]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文学八论》,刘麟生主编。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

[ Fang, Xiaoyue.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Eight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Ed. Liu Linsheng. Shanghai: The World Book Company, 1936. ]

——:“题《层冰文略》”,古直《层冰文略》。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

[ ---. “Remarks on *The Prose of Gu Zhi*.” *The Prose of Gu Zhi*.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35. ]

傅庚生:“《诗品》探索”,《国文月刊》(82)1949年: 7—19。

[ Fu, Gensheng. “Explorations into *Tastes of Poetry*.” *Chinese Literature Monthly*(82)1949: 7—19. ]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上海:开明书店,1949年。

[ ---. *Examples of Chinese Literary Appreciation*. Shanghai: Kaiming Bookstore, 1949. ]

古直:《陶靖节诗笺》。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26年。

[ Gu, Zhi. *Annotations to the Poetry of Tao Jingjie*. Shanghai: Juzhen Fangsong Press, 1926. ]

郭绍虞:“诗话丛话”,《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曹旭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Guo, Shaoyu. “The Study on the Remarks on Poetry.” *Selected Critical Essays from China, Japan and Korea on Tastes of Poetry*. Ed. Cao X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2003. ]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 ---.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4. ]

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Hu, Xiaoshi. *The Lectur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 Sequel to Collected Critical Essays of Hu Xiaosh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1. ]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 Hu, Yinglin. *Collected Writings from Shaoshi Mountain Hous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8. ]

李稚甫:“古直先生的生平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岭南文史》(1)1991: 23—26。

[ Li, Zhifu. “The Life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 of Gu Zhi.” *Lingnan Culture and History* (1)1991: 23—26. ]

刘文典:《三余札记》。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

[ Liu, Wendian. *The Reading Notes from San Yu Study*. Hefei: Huangshan Books, 1990. ]

速钦立:“锺嵘《诗品》考”,《现代学报》Vol. 1(9、10)1947: 49—65。

[ Lu, Qinli.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Zhong Rong's *Tastes of Poetry*.” *Modern Journal*. Vol. 1(9 & 10) 1947: 49—65. ]

——:“《诗品》考实”,《速钦立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 ---. “A Textual Study on *Tastes of Poetry*.” *Collected Writings of Lu Qinl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

罗根泽:《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

[ Luo, Genze. *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Wei Jin Period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Chongq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43. ]

中沢希男:“《诗品》考”,《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曹旭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Mareo, Nakazawa. “A Study on *Tastes of Poetry*.” *Selected Critical Essays from China, Japan and Korea on Tastes of Poetry*. Ed. Cao Xu. Shanghai: Shanghai



-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2003. ]
- 闵文振:《兰庄诗话》,《全明诗话》,周维德集校。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
- [Min, Wenzhen. *Remarks on Poetry from Lanzhuang. Remarks on Poetry of Ming Dynasty*. Ed. Zhou Weide. Ji'nan: Qilu Books, 2005. ]
- 闵孝吉:“评叶长青《诗品集释》”,《文学杂志》(5)1937: 36—38。
- [Min, Xiaoji. “On Ye Changqing’s Collected Annotations to Tastes of Poetry.” *Literary Magazine* (5) 1937: 36–38. ]
- 牟世金:“鍾嶸的诗歌评论”,《文学评论》(2)1962: 1—16。
- [Mou, Shijin. “Zhong Rong’s Comments on Poetry.” *Literary Review* (2)1962: 1–16. ]
- 聂崇岐:《太平御览引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Nie, Chongqi. *The Index of Taiping Yula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0. ]
- 牛懋庸:“《诗品广注》序论”,《儒效月刊》Vol. 2(6,7)1946: 1—5。
- [Niu, Maoyong. “An Introductory Essay on Annotations to Tastes of Poetry.” *Ruxiao Journal Monthly*. Vol. 2(6 & 7) 1946: 1–5. ]
- 庞俊:“享帚录”,《养晴室遗集》。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
- [Pang, Jun. “Records from Xiangzhou.” *Uncollected Writings from Yangqing Room*. Chengdu: Bazhu Books, 2013. ]
- 钱基博:“鍾嶸《诗品》校读记”,《小雅》(4)1931: 13—22。
- [Qian, Jibo. “The Textual Criticism on Zhong Rong’s Tastes of Poetry.” *Xiao Ya* (4)1931: 13–22. ]
- 钱亚新:《太平御览索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 [Qian, Yaxin. *The Index of Taiping Yulan*.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4. ]
- 钱锺书:《谈艺录》。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
- [Qian, Zhongshu. *On the Art of Poetry*. Shanghai: Kaiming Bookstore, 1948. ]
- :《石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 *Dialogue with Chen Y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6. ]
-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 [---. “Classical Literary Scholarship in Modern China.” *Writings on the Edge of Life, The Edge of the Edge of Life, A Dialogue with Chen Y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
- 阮元:“重刻宋本太平御览叙”,《太平御览》,李昉等纂、鲍崇城刊刻。清嘉庆刻本。
- [Ruan, Yuan.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of *Taiping Yulan*.” *Taiping Yulan*. Ed. Bo Chongcheng. Jiaqi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
- 余雪曼:“读《诗品》”,《志林》(6)1944: 1—4。
- [She, Xueman. “Reading Tastes of Poetry.” *Zhilin* (6) 1944: 1–4. ]
- 汪璐:《藏书题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Wang, Lu. *Remarks on the Titles for Book Collecti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 汪辟疆:“读常见书斋小记”,《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Wang, Pijiang. “Notes from *Common Reader Studio*.” *Collected Writings of Wang Pijia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8. ]
- :“工具书之类别及其解题”,《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 “The Categories and Introductory Comments of Reference Books.” *Collected Writings of Wang Pijia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8. ]
- 王士禛:《渔洋诗话》,《清诗话》,丁福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Wang, Shizhen. *Remarks on Poetry by Yuyang. Remarks on Poetry from Qing Dynasty*. Ed. Ding Fubao.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78. ]
- 王叔岷:“论鍾嶸评陶渊明诗”,《学原》Vol. 2(4)1948: 68—69。
- [Wang, Shumin. “On Zhong Rong’s Comments about Tao Yuanming’s Poetry.” *XueYuan*. Vol. 2(4)1948: 68–69. ]
- :《陶渊明诗笺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 [---. *Annotations to Tao Yuanming’s Poet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
- :《鍾嶸诗品笺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 [---. *Critical Annotations to Zhong Rong’s Tastes of Poet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
- 王运熙:“鍾嶸《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解”,《文学评论》(5)1980: 135—38。
- [Wang, Yunxi. “A Explanatory Essay on Zhong Rong’s Comments on Tao Yuanming’s Poetry.” *Literary Review* (5)1980: 135–38. ]
- :“研读古代文学须明其义例”,《望海楼笔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 [---. *Notes from the Wanghai Apartment House*. Shanghai: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1999. ]
- 王运熙 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Wang, Yunxi and Yang, Ming. *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Wei Jin Period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 伍叔悦:“文心雕龙札记”,《伍叔悦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
- [Wu, Shutang. “Reading Notes o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Collected Writings of Wu Shutang*. Hefei: Huangshan Books, 2011. ]
- :“读锺记室《诗品》”,《伍叔悦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
- [---. “Reading Zhong Rong’s *Tastes of Poetry*.” *Collected Writings of Wu Shutang*. Hefei: Huangshan Books, 2011. ]
- 许总:“论锺嵘《诗品》的曹陶品第”,《中州学刊》(6)1982: 86—90。
- [Xu, Zong. “On the Ranking of Cao Cao and Tao Yuanming in Zhong Rong’s *Tastes of Poetry*.”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6)1982: 86—90 ]
- 阎简弼:“谈艺录”,《燕京学报》(35): 1948: 271—83。
- [Yan, Jianbi. “On Qian Zhongshu’s *On the Art of Poetry*.” *Yenching Journal* (35): 1948: 271—83. ]
- 叶梦得:《石林诗话》,《历代诗话》,何文焕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 [Ye, Mengde. *Remarks on Poetry of Shilin*. *Collected Remarks on Poetry across Dynasties*. Ed. He Wenh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 ]
- 张陈卿:《锺嵘〈诗品〉之研究》。北京:文化学社,1926年。
- [Zhang, Chenqing. *A Study on Zhong Rong’s Tastes of Poetry*. Beijing: Culture Press, 1926. ]
- 锺嵘撰、曹旭集注:《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Zhong, Rong. *Tastes of Poetry*. Annotated. Cao X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 锺嵘撰、车柱环校证:《锺嵘诗品校证》。汉城:首尔大学校文理科大学,1967年。
- [Zhong, Rong. *Tastes of Poetry*. Annotated. Che Zhuhuan. Seoul: Seoul University Press, 1967. ]
- 锺嵘撰、陈庆浩编:《锺嵘诗品集校》。巴黎: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
- [Zhong, Rong. *Tastes of Poetry*. Annotated. Chan Hing-ho. Paris: Centre de publication Asie orientale, 1978. ]
- 锺嵘撰、陈延杰注:《诗品注》。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
- [Zhong, Rong. *Tastes of Poetry*. Annotated. Chen Yanjie. Shanghai: Kaiming Bookstore, 1927. ]
- :《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 [---. *Tastes of Poetry*. Annotated. Chen Yanji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1958. ]
- 锺嵘撰、杜天縻注:《广注诗品》。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
- [Zhong, Rong. *Tastes of Poetry*. Annotated. Du Tianmi. Shanghai: The World Book Company, 1935. ]
- 锺嵘撰、古直笺注:《锺记室诗品笺》。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28年。
- [Zhong, Rong. *Tastes of Poetry*. Annotated. Gu zhi. Shanghai: Juzhen Fangsong Press, 1928. ]
- 锺嵘撰、李徽教注:《诗品汇注》。韩国庆北郡:岭南大学校出版部,1983年。
- [Zhong, Rong. *Tastes of Poetry*. Annotated. Li Huijiao. Qingbei, Korea: Lingnan University Press, 1983. ]
- 锺嵘撰、许文玉注:《诗品释》。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年。
- [Zhong, Rong. *Tastes of Poetry*. Annotated. Xu Wenyu. Beijing: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29. ]
- 锺嵘撰、许文雨注:《锺嵘诗品讲疏》。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
- [Zhong, Rong. *Tastes of Poetry*. Annotated. Xu Wenyu. Chengdu: Chengdu Antique Books, 1983. ]
- 锺嵘撰、杨祖聿校注:《诗品校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
- [Zhong, Rong. *Tastes of Poetry*. Annotated. Yang Zuyu. Taipei: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Press, 1981. ]
- 锺嵘撰、叶长青集释:《诗品集释》。上海:华通书局,1933年。
- [Zhong, Rong. *Tastes of Poetry*. Annotated. Ye Changqing. Shanghai: Huatong Books, 1933. ]
-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Zhu, Ziq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and Prose Criticism.” *Collected Essays on Classic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1. ]
- :“中国文学系概况”,《清华周刊》Vol. 41 (13、14) 1934: 18—20。
- [---. “A Survey of the Departmen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Tsinghua Weekly*. Vol. 41 (13&14) 1934: 18—20. ]

(责任编辑:查正贤)